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

壹、研究動機

長久以來，人類期待著烏托邦(utopia)的實現，許多作家更著述表明對烏托邦的渴望。時至二十世紀，隨著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，烏托邦的夢想似乎不再遙不可及，但受到現代主義(modernism)反叛精神的影響，出現了質疑烏托邦的聲浪。一些反動的名詞逐漸受重視，例如：“anti-utopia”，“dystopia”，“pseudo-utopia”，“cacotopia”等，其中，又以“anti-utopia”與“dystopia”最受矚目。“anti-utopia”的中文譯法為「反烏托邦」早已約定俗成，但“dystopia”至今尚無統一的譯法，最常見的翻譯為「反烏托邦」，但使用該譯法者，多半將“dystopia”與“anti-utopia”視為同義詞。而“dystopia”的譯法則尚有「壞托邦」、「惡托邦」、「敵托邦」、「歹托邦」、「待死烏托邦」、「污脫邦」、「解烏托邦」等。二十世紀前半葉，文壇上紛紛出現反動形式的烏托邦文學作品，最具代表性者為薩米爾欽(Е.И. Замятин)的《我們》(Мы)、赫胥黎(A. Huxley)的《美麗新世界》(Brave new world)與歐威爾(G. Orwell)的《一九八四》(1984)；這三部著作向來被譽為二十世紀的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」，但就作品內涵而言，歐威爾的《一九八四》是否應與其他兩部作品納入同一範疇，似乎仍有討論的空間。

二十世紀後半葉，後現代主義(post-modernism)思潮席捲整個文化領域，舉凡文學、藝術、神學、哲學等，無一不捲入對後現代主義精神的闡釋與關切之中。現代主義對永恆、深度模式的追求所形成的焦慮文化，幻化成後現代消解式的語言遊戲¹。二十世紀八〇年代，正是後現代主義蓬勃發展的年代，向來嚴肅的烏托邦文學也受到後現代主義影響，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的面貌。一九八〇年代，後現代主義在俄國僑民作家界掀起了一陣熱潮。俄國的流亡作家出走後，受到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，也紛紛投入後現代文學創作，這個時期的俄國僑民文學具有共產主義解烏托邦(communist dystopia)的特色，而其中最具代表性者為弗拉基米爾·沃伊諾維奇

¹ 王岳川，《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》。台北：淑馨，1992年，第1頁。

(Владимир Н.Войнович, 1932A.D.~)的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(Москва 2042)。沃伊諾維奇為前蘇聯第三波流亡作家，出走前因嘲弄蘇聯體制的諷刺作品博得響亮名聲，作家離開祖國後，僑居於德國慕尼黑。蘇聯解體後，沃伊諾維奇返回莫斯科，活躍於媒體及文化界，並於一九九六年榮獲「凱旋獎」。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是八〇年代中期完成的作品，當時東歐各國的共產政權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，因此，沃伊諾維奇以莫斯科共和國的消亡，預言蘇聯的共產政權必然走向毀滅的命運，實非偶然。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在語言方面具濃厚的後現代性徵候，它一反過去烏托邦文學嚴肅的態度，荒誕、笑謔的非邏輯性語言充斥著整個文本，然而，在其看似瘋癲的話語中，卻同樣透露著發人省思的意含。

近年來，台灣有許多研究者紛紛投入後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，但研究的對象多以英美後現代文學為主，然而，除了英美文學之外，俄國後現代文學的成就同樣不容小覷，尤其在俄國後現代主義浪潮下的解烏托邦小說，更引領著世界烏托邦文學的潮流。究竟俄國後現代主義浪潮下的解烏托邦小說有何特色？本論文將以俄國僑民作家沃伊諾維奇的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，分析後現代主義解烏托邦小說的特點。

貳、研究目的

一、區別烏托邦(utopia)、反烏托邦(anti-utopia)與解烏托邦(dystopia)。

烏托邦作為理想國度的代名詞，早已約定俗成，但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的界定仍存在許多爭議；本論文將試圖從烏托邦文學的分析與比較中，釐清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之間的界線。

二、分析解烏托邦小說在後現代主義浪潮下的表現方式。

烏托邦文學在不同文藝思潮的影響下，有不同的表現方式；本論文將探討在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，烏托邦文學的表現方式。

第二節 研究課題、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

壹、研究課題

本論文包含三個主要的研究課題：

一、烏托邦體裁文學之研究：

- (一)烏托邦文學的起源；
- (二)烏托邦文學體裁的特點(包含烏托邦、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)；
- (三)烏托邦文學在不同文藝思潮下的變異；
- (四)俄羅斯烏托邦文學的脈絡。

二、個人崇拜神話主題之分析：

- (一)烏托邦文學中的極權主義；
- (二)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中，勝利者喬治(Георгий Победоносец)形象的體現；
- (三)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的個人崇拜神話主題與現實世界的關聯。

三、戲擬技巧之分析：

- (一)後現代主義解烏托邦小說的話語策略之分析；
- (二)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的各項戲擬技巧之分析。

貳、研究方法

本論文按三個主要研究課題，分別採取下列的研究方法：

一、文體分析法

烏托邦文學體裁研究方面採文體分析法：就文本的結構與內含，分析各類烏托邦文學(烏托邦、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)的特徵。

二、比較研究法

個人崇拜神話研究方面採比較研究法：透過文本與現實世界人物的比較，分析個人崇拜神話結構的特點。

三、語料分析法

戲擬技巧研究方面採語料分析法：針對文本中的語料，分析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如何運用戲擬來達成諷刺的效果。

參、研究途徑

本論文將藉由德里達(J.Derrida)的解構理論(deconstruction)以及巴赫金(М.М.Бахтин)的狂歡化(карнавализация)理論，研究解烏托邦小說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的後現代主義特徵。

一、解構理論

西元一九六七年，法國的德里達以《文字語言學》(Of Grammatology)、《聲音與現象》(Speech and Phenomena)、《書寫與差異》(Writing and Difference)三本書的出版，宣告解構理論的確立。解構理論一方面批判結構主義(structuralism)，另一方面又將批判的焦點指向接受理論(reception theory，亦稱「接受美學」(receptive esthetics))的不徹底性；隨著解釋學與解構學的互相批判和論戰，新的理解闡釋理論與文本理論逐漸形成。解構理論的目標，是拆除具有中心指涉結構的整體性，因為這種結構的固定性特徵導源於中心的先驗設置，因此，結構主義以中心性拒斥了差異性，以整體性排斥了局部性，以同一性排斥了矛盾性。於是，整個世界的結構被先驗地把握著，這種確定中心以保證其結構穩定性的做法，使結構主義能夠堂而皇之地通過批評活動，去提取早已置入結構的意義；如此，文本的內在意義在被寫出來前就已被閱讀，解讀文本的意義不過是重複先行規約的意義罷了。

解構的策略是對文本進行外在性閱讀，因此，在解構理論中，閱讀是一種「增值」，它是文本自身造成的「播撒」(dissemination)。「播撒」不斷地瓦解文本，揭露文本的雜亂無序與鬆散重複，「播撒」的拆解力量可以否定任何主題，並對文本進行內部的瓦解，在一連串的瓦解與否定之中，文本的意義永無止境地擴散著。解構理論強調，沒有一成不變的主題，也不存在先行設定的先驗結構，更沒有任何確定的解讀方式。解構使得封閉

的系統有開放的可能，德里達的解構理論並非單純對系統結構的消解，它涉及本源與構成本源事物之間的關係。作家以一種語言、一種邏輯進行寫作，而此種語言與邏輯，不但非由作家任意控制，反而約制了作家的創作。因此，文本不可只被解讀為單一作者在傳達一個明顯的訊息，而應該被解讀為在某個文化或世界觀中各種衝突的體現。

二、狂歡化理論

狂歡節(карнавал)是中世紀歐洲的民間節日，是一個自願自發、人人參與的平民大眾節日。官方的慶典是一種嚴肅、虔誠、崇高的儀式，在那裡聽不見平民大眾內心的聲音；狂歡節則是一種與官方意識形態對立的節日，在這個節慶進行期間，人們只遵循狂歡節的法則，即一套屬於它自己的自由法則。在狂歡節的廣場上，民眾盡情地吃喝、排泄、交媾，追求感官愉悅的滿足；在狂歡節的廣場上，民眾恣意地嬉笑怒罵，而他們使用的是有別於官方用語的粗鄙語言。狂歡理論的核心是民間文化、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關係。中世紀的狂歡節是民間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產物，其民間性表現在對生與死、對再生與創造的讚美，以及對自然生命力量的宏揚上。公眾廣場上笑罵嘲諷的語言、追求感官愉悅的滿足，為大眾文化的特徵，相對於官方慶典的莊嚴肅穆，在狂歡節中，「肉體的低下部位」被盡情地謳歌、嘲弄、消解與懸置，拉平了高雅與低俗、官與民、士與痞一切等級的差異與距離。

巴赫金認為，狂歡節代表著文化的離心力量，與中心話語的向心力量互相抗衡。同時，他也認為狂歡節代表的是多元、非中心與眾聲喧嘩，而不是要建立新的一元中心權威和神話。巴赫金所謂的「狂歡化」是藝術形象的語言，是狂歡節轉化為文學的語言。

第三節 文獻回顧

目前關於後現代主義解烏托邦小說研究的相關文獻十分有限；重要文獻有布克(Booker M. Keith)的《現代文學中的解烏托邦之衝擊》(The Dystopian Impulse in Modern Literature)，萊恩海斯(Karen L. Ryan-Hayes)的《當代俄國諷刺文學》(Contemporary Russian Satire)與西斯克(David W. Sisk)的《現代解烏托邦中的語言轉變》(Transformations of Language in Modern Dystopias)。

布克的《現代文學中的解烏托邦之衝擊》是一部研究現代烏托邦文學的專書，並以二十世紀的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小說為主要的研究對象。布克在本書的第五章〈俄國式的後現代主義：當代共產主義解烏托邦〉(Postmodernism with a Russian Accent: The Contemporary Communist Dystopia)提到，後現代主義挑戰了早期解烏托邦小說的嚴肅態度，而解烏托邦小說則多方面表現出後現代主義的理想模式。作者認為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具有解烏托邦小說的戲擬傳統，是俄國後現代主義文學中，最佳的共產主義解烏托邦之範例。第六章〈懷疑主義：西方的後現代主義解烏托邦〉(Skepticism Squared: Western Postmodernist Dystopias)中則指出，後現代主義的解烏托邦小說是對烏托邦提出有力的懷疑。萊恩海斯在《當代俄國諷刺文學》的第五章〈回歸的解烏托邦：沃伊諾維奇與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〉(Dystopia redux: Voinovich and “Moscow2042”)中指出，沃伊諾維奇的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是對薩米爾欽(Замятин)、赫胥黎(Huxley)與歐威爾(Orwell)解烏托邦小說的戲擬，並藉以諷刺蘇聯社會；另外，在這一章中，還分析了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對其他文本的戲擬。

西斯克在《現代解烏托邦中的語言轉變》的第一章〈解烏托邦的語言〉(The Language of Dystopia)中表示，烏托邦小說本身含有諷刺的意味，而解烏托邦小說則藉由戲擬的手法來諷刺烏托邦小說，他認為，語言在解烏托邦小說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解烏托邦文學基於其特殊的語言而自成一格。此外，在這一章中，西斯克轉述了亞歷山卓·歐戴利基(Alexandra Aldridge)在《解烏托邦中的科技世界圖景》(Scientific World View in Dystopia)中對烏托邦小說的分類。按歐戴利基的看法，烏托邦小說可分為五種基本類型：人間天堂(the earthly paradise)、宗教的烏托邦(the religious utopia)、

黃金時代(the Golden Age)、民間烏托邦(the folk utopia)與計畫完善的社會(the planned society)。柏拉圖(Plato)的《理想國》(Republic)與摩爾(Thomas More)的《烏托邦》(Utopia)屬計畫完善的社會一類，該類型的烏托邦小說對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小說的發展，具有重要的意義。而在第八章中，西斯克則按文本中解烏托邦是否有被顛破的可能，將解烏托邦小說劃分為三種類型：無望的解烏托邦(bleak dystopia)、具爭議性的解烏托邦(disputable dystopia)，以及充滿希望的解烏托邦(hopeful dystopia)。而西斯克對解烏托邦所做的分類，似乎無法涵蓋所有俄國後現代主義解烏托邦小說，尤其是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對象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。關於《莫斯科二〇四二》究竟為何種解烏托邦，本論文將在第二章中提出討論。

